

株洲风物

醴陵群力瓷厂的点滴印记

晓菲

提起群力,醴陵人谁不熟悉?中国为瓷器的故乡,醴陵为瓷都,釉下五彩名瓷发源地。群力就是一家生产釉下五彩高级细瓷的专业厂家,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生产生活用瓷、国家宴会瓷、国家礼品瓷和国家陈设瓷的重要生产基地。群力,也是我父亲工作过的地方。

那时候的早晨,当淡蓝色的雾气在厂子后山缭绕,空气中弥漫着水雾时,成型车间、球磨车间、炼泥车间、制模以及木工房,几乎同时响起机器的轰鸣声,盖过鸟雀的叫声,盖过食堂开饭的铃声,这种火热与激情的存在,是群力瓷厂留在我脑海里最深的记忆。

辉煌旧事

有天,我撑起雨伞,进了群力,在那独自徘徊。厂里的地面不再清洁宽阔,到处长满各种杂草,雨滴落在黑色的房顶、破木门、旧铁锁和结着蜘蛛网的木窗上,多了被风雨侵蚀的沧桑味道。这番景象,我极为熟悉却又分外陌生。熟悉的是因为我打小就在那里生活过,对于它的布局了然于胸;陌生是缘于它的静寂,以前厂子是热闹的,小伙伴们在这里肆无忌惮地奔跑着、欢笑着,高大的法国梧桐下,三三两两的职工们闲谈着,打闹着,欢声笑语不时充斥于耳。而今,法国梧桐虬枝盘结,显得老态龙钟,整个厂区都空空荡荡,再也看不到小伙伴的身影,也听不到大人物的欢笑……

这里的厂房与厂房相连,我其间转着圈儿,脑海里努力搜索有关群力的史料记载:群力瓷厂前身为湖南艺术瓷厂,始建于1958年,占地面积7500平方米,厂内建有七栋五层职工楼房以及陶瓷机械设备50多套。建厂以来,群力瓷厂的技术骨干群策群力,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创造了皮印线条代替釉下彩绘手工勾画线条的传统技法,使釉下彩绘手工技术与皮印线条相结合,提高生产效率四、五十倍;1959年,艺术瓷厂和陶研所一起,首次承担了北京十大建筑中的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工人体育馆(简称“三馆瓷”)和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和湖南厅的用瓷的设计生产任务,至1966年,共国家用瓷三万多件,为醴陵日后承接人民大会堂釉下青花139国宴瓷铺平了道路;1976年,全厂员工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敬仰和怀念,精心设计两款十多个大花瓶,其中两个花瓶摆放在毛主席遗体左右两侧;1981年,中国女子排球队首次夺得世界冠军,群力瓷厂精工绘制一件高五十公分的花瓶赠送给女排,以示祝贺,花瓶诗画并茂,配以“电闪雷鸣跨五色,雄狮怒吼震千山”的诗句,深得全体女排队员的喜悦……

“群力瓷厂天下有名,天下第一,六十年头里获得国家金奖两个,现在好多场厂子都比不上。”我父亲每每提及,一脸的得意。

父亲在瓷厂干的是木工活,小时候经常被带到厂区看他跟同事们干活,惯是两人一组,木料卡在木架子上,一个推,一个拉,一块块木板就此成型,然后变成车间里的窗、门、柜子,或者是职工宿舍的床、桌子、椅子;做的最多的物件,则是装瓷器的框子,那些精美绝伦的碗、盘、杯、盏、瓶便是装进父亲亲手做的框里运出城,并销售遍及五湖四海的。

我是群力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市场竞争加剧,群力瓷厂风光不再,很多时候工资也发放不下来,敏感的父亲提前感觉到了这种变化,从群力瓷厂调出,进了再生资源公司,算是暂时化解了一家人的生活危机。而我,关于群力的记忆,也就于此断档。

我还记得,随父母在厂里住时,常常半夜被机器的轰鸣声吵醒。我想不明白工人们为什么不需要休息,那些机器又怎会那样听话,没日没夜不知疲倦地转动着。我有过很多的担心,担心机器的速度太快,会发生什么意外,甚至感觉到机器转动时,整个宿舍楼都跟着震动,我担心房子是否会被震塌。

我的担心终究是多余的。父亲的朋友老康一直操纵着那些庞然大物般的机器,没有丝毫的闪失。老康年纪不到四十,经常拿着抹布、螺丝刀、扳手,围着机器点检、擦灰、调节阀门。老康之所以操作从来没有闪失,就在严苛的工作态度,面对一台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他目光笃定,操作娴熟,犹如久经沙场的统帅。他常说,任何一道工序都马虎不得,这制泥、练泥要做到配方有数据,比例要精确,坚守八个“一样”:精工选料像淘金一样;泥釉配方过磅如配药方一样;清洁卫生像船上一样;生熟泥分级堆放像百货公司商品陈列一样;消灭杂质如消灭敌人一样;闲人免入像战场放哨一样;除纸屑像站岗一样;练泥水份准确像秒针一样……

时代的印记

雨停了,原本黑沉沉的天空,很快被一抹雨后绚丽的晚霞唤醒。我收起雨伞,用目光搜寻着旧日印迹,用镜头拍摄下先辈们使用过的老机器,老物件,哪怕是破木门、旧铁锁以及门廊下随意放着的椅凳,都被我一一扫过。

拍完照,告别门卫,迫不及待地翻看照片,那些沉睡在岁月深处的物件似乎都慢慢睁开了眼睛,渐渐苏醒了过来呢!

走出瓷厂大门,我再次细细端详这座巍峨的大门楼,“湖南醴陵群力艺术陶瓷有限公司”的字样还在,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然而,上面的“红官窑”三个大字更为醒目,这使我尤为惊讶,后从朋友处得知,那是200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铁映来醴陵视察时题的名,意为醴陵窑和醴陵瓷被分别称为当代“红官窑”和“国瓷”。

欣喜之余,收到了朋友转发的新闻报道:知名收藏家、古陶瓷研究者罗磊光谈醴陵,讲述了醴陵人为釉下五彩瓷所作出的贡献。罗磊光坦言,醴陵釉下五彩瓷,从无到有,从粗到细,由实用到观赏,从简单再到复杂,一步步验证着醴陵瓷器的发展历程,留下了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很多珍品被世人争相收藏……

闻此言,我心释然,现时,醴陵群力瓷厂不正是一处红色官窑遗迹吗?它的存在,便是留驻于醴陵古瓷城的时代印记。



株洲往事

一百年前的5月4日,因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那天,北京的青年学生纷纷走上街头,随后,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了进来,他们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方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那天,有两个株洲籍学生——何孟雄、陈大榕成为爱国运动的急先锋,后来一个成为职业革命家、无产阶级革命烈士,一个则在教育、文化上颇有成就。

何孟雄,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何孟雄(1898年—1931年),炎陵人,1919年3月放弃赴法勤工俭学后,成为北京大学的旁听生。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何孟雄在北京大学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聆听许多著名教授、学者的授课和讲演,并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活动,成了学校中一名思想进步的活跃分子。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何孟雄和北大的同学一道,参加了游行示威,参与包围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等行动,成为北京大学学生运动中的重要骨干。

6月3日,何孟雄在街上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时,被反动军警逮捕,关押5天。在全国各阶层人民的严重抗议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学生,并罢去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官职。中国代表团被迫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以后,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何孟雄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3月,何孟雄与缪伯英、邓中夏等一起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年5月1日,他与北京工读互助团的7名青年学生发起纪念五一劳动节的示威宣传游行活动,被捕入狱,5月17日经李大钊等出面营救获释。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何孟雄是全国最早的53名党员之一。中共“一大”闭幕不久,何孟雄和缪伯英在北京结婚,被誉为“一对‘英’‘雄’夫妇”。1921年底开始,他先后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中共唐山市委书记、武汉市委组织部长等职,领导工人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何孟雄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淮安特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军事委员会书记、南京市委书记,上海浦东、沪中、沪西区委书记等职。1931年1月,何孟雄等23人在上海被捕,2月7日英勇就义。

陈大榕,曾参与火烧赵家楼

北京赵家楼是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五四运动那天,到底谁放了火烧赵家楼的第一把火,历史记载是湖南邵阳人匡互生。

陈大榕在1977年所写的《八十自述》中称自己和俞劲参与了火烧了赵家楼。

陈大榕(1897年—1986年),字寿丞,株洲芦淞区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他回忆,五四那天,当游行的“大队”进行至曹汝霖住宅时,湖南邵阳籍同学匡互生由后墙破窗而入。初为卫士所阻。匡君晓以大义,慷慨激昂,卫士为之感动,任其开进后门。大队一拥而入。余与俞劲同学引火焚烧院中书房一幢,情势为之扩大。北洋政府惧于事态之严重,南方政府之反对,全国学生之响应,舆论之抨击,遂不敢轻率承诺矣。”

当时在现场的高师学生张石樵后来在《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中说“亲眼看到北京高师一同学用煤油把房子点着了……,真正放火者为俞劲(又名慎初),俞劲建国后执教于西北农学院,他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称是匡互生叫他去买火柴的,火是匡互生点燃起来的。”

因时间的久远或其它原因,很多人的回忆会有模糊与出入。这第一把火到底是谁放的其实并不重要了,因为所有人的回忆都肯定一点,匡互生既是这次运动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还是冒着敌人的枪口冲在前面的第一人。火烧赵家楼的这次行动,匡互生无疑应该记头功的,陈大榕、俞劲等也属于运动中的急先锋。

今天的株洲人知道陈大榕的不多了,但民国时期,他是湖南很有影响的社会名流,先后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负责人、湘潭县长、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陈大榕任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常务理事,并创办《湖南日报》,任第一任社长。他对株洲、湘潭的教育也多有贡献,1941年株洲第一所中学——建宁中学创办,陈大榕被聘为首任校长,除此之外,他还担任过湘潭一中的校长,上世纪八十年代还与湘潭教育界有往来。他的妻子吴琛则曾在湘潭另一所学校担任校长。

1949年,陈大榕去台湾,后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以敢于直谏闻名。他去世后,蒋经国题写了“寥廓扬休——寿丞委员千古”的题词。

陈大榕虽然属于国民党官员,但亦堪称爱国人士,他的主要贡献在文化、教育领域。

百年前的「五四」,两位株洲人曾是急先锋

余意明

老物件

杆秤

倪锐

小时候,每到吃鱼时,妈妈总说:“吃鱼籽会不认得秤啊!”我不知道这鱼籽和秤有什么关联,一看大人们吃鱼籽正欢呢,难道他们就不怕不认得秤?大人哈哈大笑,我们已经认得秤了,再吃鱼籽也没关系。倒是鱼籽和秤杆上的星星点点还是有几分相像的。

一根杆子,一个秤坨,一个秤盘,一个钩子,几根绳子,就组成了一杆秤。除了挂住秤盘的三根长绳,在秤杆上还有前一后两根挂绳,靠近杆头的那根绳子提起来,可以称重一点点的物品,靠近秤尾的那根挂绳提起来,可以称轻一点的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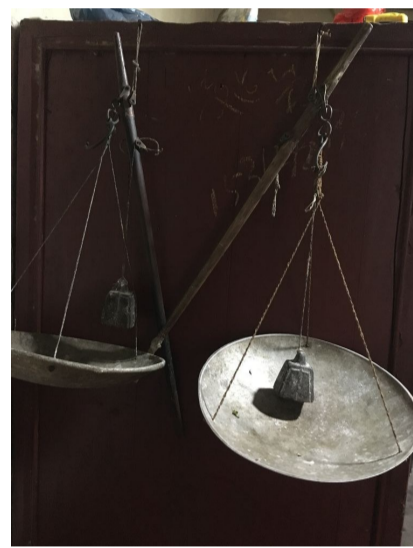
我家的杆秤就称过很多东西,米油面、小菜、稻谷、柴火、猪狗羊、鸡鸭鹅……甚至我们几姊妹都被用杆秤称过。

农村形容不会游泳的人叫“秤砣落”,自然老师在教我们学习沉浮这节课时,做实验阐述了这个问题。搞笑的是,当年的老师还真的搬来了一把杆秤,在一些物品浮在水面上时,她直接把一个秤砣丢了进去,然后说“这就是秤砣落。”

曾经在湘天桥农贸市场的一个南杂店打过零工,店里有两杆杆秤。老板娘东西有一手绝活,吊绳子的秤砣前面的绳子对准要称的位置,后面的绳子稍稍往前带一点点,秤杆的尾巴就翘起来了,顾客的脸也随之绽放,“好好好!红秤!”市场中间还挂有一杆公平秤,如有顾客觉得短斤少两不放心,可以自己去公平秤处一称。公平秤也是一把杆秤,好多顾客认不得秤,老板娘又经常带着他们在那里用惯有的手法一试试究竟,最终顾客满意而归。

妈妈没那么多奥妙,去赶集卖蛋时,只知道我家的鸡蛋个大,十个鸡蛋就是一斤。买蛋的都是林学院的教授老师们,知识分子的他们一般都自带一个小小弹簧秤,一称,果不其然。遇上差那么一丁点时,妈妈会随手从蛋篮里挑个最大的补上,反而是鸡屁股里挤出来的,多给点不吃亏。遇上其他买蛋的,妈妈的杆秤都会毫不计较地尾巴一翘收秤,所以妈妈篮子里的蛋卖得比别家的都快。

我也见过做秤的,也是在湘天桥农贸市场,有个安化人自己开的杆秤店,店里



挂满了杆秤,大的小的长的短的,星星点点好多。只是后来,人们改用天平秤改用电子秤,一称一按,连价格都算出来了,杆秤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去乡下路边买小菜,还是偶尔可以遇见拿杆秤的小贩,认识杆秤的人却是越来越少了。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挑江山哪呀哪呀,你就是那定盘的星……”歌里如是唱,这针对的是当官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做人总要把良心放中间,才能睡得安稳踏实”,这是妈妈告诫我们的。

征稿启事:

一件旧物,一段旧时光。光阴如水般流逝,曾有的悲欢离合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渐行渐远的老物件,老一辈人曾经的“老伙计”,每一件都有感人的故事,把这些老物件以及背后的故事汇集在一起,就是社会的缩影、时代的写照与文化的记忆。

这里是《株洲日报·文化周刊》全新打造的新栏目“老物件”,若你过往的人生岁月里,也有这样的老物件、老故事,请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下来,并发送至邮箱 yzyh83@163.com,让我们用这张新闻纸帮你镌刻永恒。

文化快评

纸质书与电子书,哪个更发光?

从玉华

当你在地铁玩手机的时候,她在“读书”,读书二字加黑加粗,重读。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语境就像黑衬着白,煤球里藏珍珠。其实,地铁里低头族,很多人在手机上读书,用 Kindle 读书。亚马逊早早就宣告电子书销量超过纸版书。严格说,不会发光的纸质书并不比发光的屏幕,更发光。被纸质书映衬的脸,并不比被屏幕照亮的脸,更光亮迷人。

电子书、纸质书的较量,争鸣已经很多年了,按下不表。在手机上,我用破碎的时间,读了不少书。奇特的感受是,无论你身处何处,何时开启哪一页开始读,都会发现你不是一个人在读,而是一支军队,千军万马跟着你,一本书,有海量的眉批、评论,那是纸质的留白处不容的。读到某处细节,你心有戚戚焉,手指划开批注,发现无数的脚印、声音在这里停留。

这样的点多了,就会发现,你读完一本书,就像读了好几本书。大家会一起谈论一本书,感觉从作者的第一个字开始恋爱,到最后一个字读完,失恋。那种读书的快乐,单纯且热闹。

我也爱买书,家里最大的一面墙贴了书,可它还是以惊人的速度蔓延,长着腿儿似的到处爬,入侵了家里的角落角落,看着那些无处不在的书,我真是感慨:在北京近一千万平方米的房子,里,胳膊抡到的每一个弧都是辛苦拿银子换的,书的附加成本太高了。

可我读的速度跟不上买的速度,正像这个知识焦虑时代很多人的病症一样:以拉稀的速度买书,以便秘的速度读书。

纸质书有它独特的魅力,尤其是看到手写的有温度的眉批,就像千山万水得到一只漂流瓶。

我记得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有一段话:“我站在骆驼的前面,看它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它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

读着读着,我的牙齿也动起来了,我在旁边的空白处写下:“哈哈哈哈哈,太有意思了,我的牙齿也动起来了。”多年后,这本书传到了我上小学的女儿手上,她读到文章,看到我留下的眉批,也写了一段:我也是,我的牙齿也动起来了。

真是一段美好的文字,用了几代人好几张嘴巴来咀嚼。我真希望我女儿的女儿,也能看到这本书,这段话,这段祖传标注,说不定,她的牙齿也会动。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阅读方式,没有孰高孰低。我在想,若干年后,电子书长什么样?我们会拥有更高科技的、保护视力、看起来似纸非纸的“纸张”?读马丁的小说《权利的游戏》,可以随时切换到了电视剧的场景,读到某处地理名词,可以调用博物馆、图书馆的资源?我们像科幻电影里一样,戴着特制眼镜,葛优躺就能博览全书?

可无论图书怎样智能化,怎样 ALL IN,读书都是一个需要坐冷板凳、平心静气的精神之旅。奔腾的 5G、6G、7G,都不如读书人一颗奔腾的大脑。正如读林海音,那些牙齿动起来的感动,是会穿透百年的。



车间里的旧物件